

阳明精粹

卷壹——哲思探微——
撰著 张新民



孔學堂書局

贵州人民出版社



阳明精粹

卷壹

哲思探微

撰著 张新民



孔學堂書局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省新闻出版局重点图书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7XZX004)

“明清时期贵州阳明学地域学派研究”成果之一



• 民盟贵州省委直属经济支部
• 贵州向黔进集团



编 委 会

顾 问 彭晓勇 宋 健

总 策 划 何 京 张 Jian 建

主 编 张新民

执行主编 苏 桦 何 京

编 委 李 筑 张 Jian 建 于民雄 龚妮丽 石宇波

连兆华 饶德奎 何顺峰 闫克松 潘新培

莫江涛

序

李 军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兴与衰、强与弱，根本在于其文化的特质。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张力，产生了大量古今异时共存、中外异地共赏的精品、珍品，丰富了人类优秀文化的智慧宝库。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如此辉煌灿烂而绵延不绝。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和磨难，这条深植于中国人心中的文化血脉一直汨汨流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成为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支撑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厦，是无数古圣先贤的思想智慧构建起来的，这其中，王阳明无疑是贡献卓越者之一。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他的思想集心学之大成，代表了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成为当时的儒学主流。阳明心学还衍生出众多派系，最为著名的就有江右学派、湖湘中学派、泰州学派等心学七派，把阳明心学传播发扬到大江南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近现代名人，无不从阳明心学中汲取养分。阳明心学还远播海外，在日本、韩国等国形成分支，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成为显学，为推动明治维新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当代，研究与弘扬王阳明的学说同样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需要充分挖掘和光大阳明学说中积极的、优秀的思想成分，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贵州是王阳明最初布道之地。500年前，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潜心修学，悟出了“知行

合一”“致良知”的“大道”，并创办龙岗书院，广收弟子、讲授心学。他的学说极大地影响了贵州，黔中王门学者、旅黔阳明后学以及清朝乃至民国时期的一些与贵州有渊源的学者，都努力践行其学说。2007年，贵阳市提出“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城市精神，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王阳明的知行学说。可以说，贵州有深入开展阳明文化研究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同时也责无旁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年3月在全国“两会”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就深刻指出，王阳明曾经在贵州参学悟道，贵州在这方面很有优势，希望在这方面继续深入探索。这一重要指示既肯定了贵州在弘扬传统文化上所作出的努力，也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

《阳明精粹》丛书的编写和出版，迈出了贵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弘扬阳明学说的重要一步，十分令人欣慰。这套书的编者是贵州本土著名学者，精心设计内容、结构，遴选、注释和评点王阳明著述及思想的精华。“精粹”二字，点明了该书的特点在于精而不在于全，力求通过浓缩提炼，让广大读者能够比较轻松地进入博大精深的阳明思想殿堂，受到启发和教育。该书的编纂思路和编写方法，与之前浩如烟海的王学研究著作相比，具有较大的开创性。衷心希望省内外乃至海内外更多专家学者参与到王学研究这项事业中来，通过孔学堂书局出版更多阳明学研究的图书，惠及普通大众，使阳明学说焕发出新的光辉，更好地为当代社会服务。

（作者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



贵州省贵阳市阳明祠正殿内王阳明朝服大像

目 录

第一章 迈向圣学之路 1

- 一、立志圣贤之学 / 1
- 二、大悟格物致知之旨 / 6
- 三、思想资源的广泛吸收 / 9
- 四、心学方法的早期尝试 / 13
- 五、不可断灭的种性 / 16
- 六、孝悌为仁之本 / 21
- 七、难得的人生增长缘 / 25
- 八、本体世界的证入 / 33

第二章 良知教的形成与开展 40

- 一、默记“五经”以印证心性 / 40
- 二、“六经”皆心之纪籍 / 46
- 三、尊经即是尊道 / 50
- 四、动忍增益必有创获 / 53
- 五、寻找下学上达的接引方法 / 60
- 六、教学如扶醉人 / 65
- 七、总结消兵息乱之道 / 71
- 八、良知教的揭出 / 75
- 九、良知学的政治批判意义 / 83
- 十、无滞无累的狂者胸次 / 89

第三章 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说 97

- 一、心与理不二 / 97

二、万物一体的价值论贞定 / 102

三、意义世界的一体化显现 / 104

第四章 知行一体的生命行动哲学 111

一、“知行合一”学说的提出 / 111

二、从心学体用一元论看知行合一 / 113

三、从工夫论看知行合一 / 115

四、从主体论看知行合一 / 117

第五章 静定、立诚与格物思想 126

一、静坐体认与事上磨炼 / 128

二、经典依据与诚意要旨 / 133

三、“心与理合”意义下的“格物”说 / 138

第六章 良知学说与精神生命的安顿 147

一、先天良知与后天经验 / 148

二、良知的超越性与内在性 / 152

三、良知是生命的活泼机藏 / 158

四、良知的绝对主体性地位永远不能失落 / 162

五、致良知说的实践论意义 / 168

第七章 天泉证道与四句教 175

一、至善者心之本体 / 175

二、“四有”“四无”相资为用 / 179

三、工夫必须彻上彻下 / 182

四、善恶只是一物 / 187

五、形上世界的开放与包容 / 191

六、重建儒家“无”的智慧 / 195

七、儒者必有的超越情怀 / 200

八、坚持儒家的精神发展方向 / 203

第八章 王学的传衍分化与修证调整 215

一、优入圣域之学 / 215

二、人病而非法病 / 222

三、笃实工夫不可放废 / 229

四、意乃心之灵窍 / 236

五、最后一位理学家 / 244

参考文献 256

第一章 迈向圣学之路

王阳明一生的思想变化，历来说法颇多，但龙场悟道乃一关键性转折，则向来均无异议。阳明亦自谓：“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工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真下承当耳。”又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体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①可见以龙场悟道为其思想发展的一大分界坐标，乃是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的结果，非面临极限体验即难有此大彻大悟的生命突破，亦为王阳明本人一贯的看法。也就是说，龙场悟道之前，王阳明尚学无宗主，始终徘徊在各种思想力量的融突碰撞之中，学派立场的归属仍是一绝大的问题，因而他的思想变化，乃是“学”的变化——即个人如何契入本体以安身立命的变化。而龙场悟道之后，他的学问宗旨已清晰可定，以后虽随一生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成熟，但目的旨趣始终前后一贯，所以他的思想变化，乃是“教”的变化——即如何从本体开出方法以教化他人的变化。而无论“学”的变化或“教”的变化，中心旨趣均为如何达致圆融究竟的生命境域，证入实存主体固有的人性真实，实现成圣成贤的终极目标。

一、立志圣贤之学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十日生于浙江余姚，曾筑室故乡阳

^① 以上均引自钱德洪《刻文录叙说》，见《全集》卷四十一“序说”，下册，第1575页；该文又收入《钱德洪语录诗文集佚》，见《徐爱钱德洪董澐集》，钱明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189页。

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①。《年谱》说他是晋光禄大夫王览后裔，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即览之曾孙，然后一说从之者虽多，却未必准确。^②阳明高祖王与淮精研《礼》《易》，曾著《易微》数千言，祖父王伦（？~1490），字天叙，好于轩中四周种竹，时常啸咏其中，人称竹轩先生，亦有《竹轩稿》《江湖杂稿》行于世。父亲王华（1446~1522），字德辉，号实庵，晚年又号海日翁，因常读书龙泉山，人称龙山公，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第一名，官学士、少詹历官，为人“有器度，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广贵幸，华讲《大学衍义》，至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指陈甚切。帝命中官赐食劳焉”^③。正德初，进礼部左侍郎，以阳明忤逆宦官刘瑾，出为南京吏部尚书，坐事罢免。刘瑾事败后，乃复旧职。龙山公爱绍兴山水佳丽，又为先世故居，遂自余姚往迁居之。晚年尝偶书堂联云：“看儿曹整顿乾坤，任老子婆娑风月”^④；亦可见其晚年心曲。撰有《龙山存稿》《南草堂稿》《礼经大义》《杂录》《进讲畚钞》诸稿藏于家。

阳明幼年在原籍生活，相传五岁尚不能言，十一岁随龙山公赴京师过金山寺时，却能豪迈赋诗，慧智惊人，并以学圣贤为第一等事，出语不凡。十三岁母亲在京师病逝，居丧哭泣甚哀。十五岁出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又欲献书朝廷，请缨靖难，龙山公斥为“狂”才停止。十七岁前往江西娶亲，临行婚礼的那一天，他散步偶入铁柱宫，与道士谈养生方法，竟通宵相坐忘归，次日凌晨方被人找回。翌年携夫人诸氏归余姚，船过江西广信时，曾去拜访名儒娄谅（1422~1491），谅尝师事吴与弼（康斋）。与弼之学“上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語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谓‘敬义夹持，诚明两进’者也。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学者依之，真有途辙可

① 按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公元1529年1月10日，陈荣捷已有明确考订，检陈垣《中西回史日历》可得，今人著作多有作1528年者，均误。

②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序》：“其先出晋光禄大夫览之裔，至曾孙右将军羲之，徙居山阴。”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其先琅琊人，晋光禄大夫览之后。览曾孙羲之少随父旷渡江家建康，不乐，徙会稽。”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引《系状》：“推其华胄遥遥，远派于晋高士羲之，光禄大夫览焉。”（以上分见《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卷三十八“世德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下册，第1230页、1406页、1401页）今人诸煥燦列举众多据，力辨其说之非，似当可从。诸说见《王阳明不是王羲之的子孙》，载《国际阳明学研究》2013年第3卷，第79~106页。

③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册，5159页。

④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二《王守仁书于谦祠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3页。

循”^①。故晚明大儒刘宗周盛赞他能“涵养性情，安贫克己，不事著述而独契道真，言动之间悉归平淡。充其所诣，庶几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又尝较诸他时贤云：“薛文清（瑄）多困于流俗，陈白沙（献章）犹激于声名，唯康斋醇乎醇”^②与弼论其门下学人，则以“娄谅确实，杨杰淳雅，周文勇迈”许之^③。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虽宗程朱而善治《三礼》，然胡居仁仍讥其近陆子，罗钦顺亦谓其似禅学^④。他们都继承了宋代程朱学学术渊源脉络的传统，但又以江西学人群体的方式开创出不少属于自身学派的独到特点^⑤。娄谅与阳明相互谈及宋儒格物之学，并明确告诉他说：“圣人必可学而至。”^⑥阳明深以为然。尽管吴与弼—娄谅一系哲学上的创见不多，但都是儒家正统学说的信奉者和践履者，且在当时发出很大的声光回响，所以阳明与娄谅的这次见面，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性事件，标志着他开始向慕并追求儒家成圣成贤之学^⑦，而后来波澜壮阔的思想言说展开，均与早期胸志萌动的涓涓细流有关。尽管如此，他广读群经子史，泛览辞章，不仅反映了他思想兴趣的广泛，而且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崇仁学案一》“聘君吴康斋先生与弼”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16页。

② 以上均引自邵廷采：《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刘宗周全集·附录四》，吴光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册，第539页。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崇仁学案一》“聘君吴康斋先生与弼”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15页。

④ 《明史》卷二八三《娄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册，7263页。

⑤ 参阅陈荣捷：《明代之程朱学派》，见氏著《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331~351页。

⑥ 钱德洪辑：《年谱》“孝宗成化二年己酉”条，《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下册，第1233页。

⑦ 《阳明先生集要》本《年谱》“弘治二年己酉”条称阳明“谒娄一斋谅，语格物之学，先生甚喜，以谓圣人必可学而至也。后遍读考亭遗书，思诸儒谓众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因见竹，取而格之，沈思不得，遂被疾。”《明史·本传》亦云：“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可见明清学者均以为阳明与娄谅的最初晤面，乃是其学思经历的一大重要转折，并将其视为认真研读儒家圣贤经典的开端，甚至直接与后来的格竹一事联系，以为乃前后相续的具有思想谱系连续关系的变化发展过程。又阳明格竹之年，《王阳明全集》本《年谱》系于“孝宗弘治五年壬子”条下，时阳明乃二十一岁，今人或以为与《集要》本互歧，盖不知后者着眼于前后思想源流之一贯，乃采用传统史家惯用之“先年终言”法，且具书一“后”字，清楚示明其事之产生，乃在见娄谅立志之后，故二书实无扞格，恰可互参。或后者乃前者之节录，损益甚多，均各有其价值，乃研读王阳明不可不常置案头之书。然钱氏所辑《年谱》，实乃阳明门人共同纂辑，且成书于王氏卒后三十五年，最为早出，多可信据，亦断无疑义。以上分见《阳明先生集要·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页；《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册，5168页；《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第1223页。

也显示了他精神来源的多样。《年谱》载他与娄谅见面后的次年，返回家乡余姚苦读的情形说：

明年，龙山公以外艰归姚，命从弟冕、阶、官及妹婿牧，相与（阳明）先生讲析经义。先生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四子见其文字日进，尝愧不及，后知之曰：“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谏，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过矣。”自后四子亦渐敛容。^①

可见他与娄谅见面后，的确便以圣人之学自勉，发愤日夜苦读，但是文字虽然日进，方法论上仍为向外求知，与自证自悟的心性正学距离尚远。不过又颇能反躬自省，大有一般人难以具备的改过责善能力，依然可以窥见他以后建立心学体系早期思想发展的线索端倪。只是要将希圣希贤理想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格，则尚有很长一段生命磨练的人生实践道路要走。外缘环境和人的根性存在相互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生命固有的潜能和应有的价值。

弘治五年（1492年），阳明二十一岁，在家乡中举人，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朱子遗书读之，并在父亲官署中观竹“格物”，劳思致疾仍不得其理，于是对朱子之学颇有怀疑，并随世改从辞章之学。这是他依据朱熹之学，尝试以“格物”的方法“学圣”的一次重要人生经历，虽然因方法不当构疾，反映了思想世界一时出现的困境，但同样也是影响终生的一次思想性事件，酝酿了今后可能发生的另一条与朱子不同的心学取向的思想发展路线的出现。

弘治五年（1493年）与八年（1496年），阳明两次会试下第，乃留情武事，读兵书，谈养生，有遗世入山之意。二十八岁中进士，观政工部，心情转趋激奋，向朝廷上西北边务八事^②，意气风发，言辞剴切。二十九岁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三十一岁以呕血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修习道家导引之术。三十三岁主考山东乡试，策问议朝廷礼乐之制，试录

^① 钱德洪：《年谱》，《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弘治二年己酉”条，下册，第1223页。

^② 见《陈言边务疏》，《全集》卷九，“别录一”，第285~286页。八事分别为：蓄材以备急，舍短以用长，简师以省费，屯田以足食，行法以振威，敷恩以激怒，捐小以舍大，严守以乘弊。

颇见经世抱负。今阳明文集中，尚存有其《乡试录》云：

圣人各有忧民之念，而同其任责之心。夫圣人之忧民，其心一而已矣。所以忧之者，虽各以其职，而其任之于己也，曷尝有不同哉？昔孟子论禹、稷之急于救民，而原其心以为大禹之平水土也，虽其所施，无非决川距海之功，而民可免于昏垫矣；然其汲汲之心，以为天下若是其广也，吾之足迹既有所未到之地，则夫水之未治者，亦必有之矣；水之泛滥，既有所不免之地，则夫民之遭溺者，亦容有之矣；夫民之陷溺，由水之未治也，吾任治水之责，使水有不治，以溺吾民，是水之溺民，即吾之溺民也；民之溺于水，实吾之溺之也，吾其救之，可不急乎？后稷之教稼穡也，虽其所为无非播时百谷之事，而民可免于阻饥矣；然其遑遑之心，以为万民若是其众也，吾之稼穡，固未能人人而面海矣，能保其无不知者乎？民之树艺，即未能人人而必知矣，能保其无不饥者乎？夫民之有饥，由谷之未播也，吾任播谷之责，使谷有未播以饥吾民，是饥之厄民，即吾之厄民也，民之饥于食，实吾之饥之也，吾其拯之，可以缓乎？夫禹、稷之心，其急于救民盖如此，此其所以虽当治平之世，三过其门而不入也欤！虽然，急于救民者，固圣贤忧世之本心，而安于自守者，又君子持己之常道，是以颜子之不改其乐，而孟子以为同道于禹、稷者，诚以禹、稷、颜子莫非素其位而行耳。后世各徇一偏之见，而仕者以趋时为通达，隐者以忘世为高尚，此其所以进不能忧禹、稷之忧，而退不能乐颜子之乐也欤！^①

上述文字，完全出于儒家正统忧民济世立场，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之心，可谓奔驰澎湃、一览无余。无怪乎“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御夷、息讼，皆有成法。录出，人占先生经世之学。”^②可见超然物外与积极用世两种心态，始终在他心中交织激荡，形成了他早年复杂的人生态度，也决定他多方面地吸取了儒道释三家的共同思想资源。但毕竟儒家圣人之学的吸引力最大，也最适合他的根器才情，虽然不同时期的心境和语境会造成不同思想资源强弱表达的差异，但整体地看仍以儒家思想资源及其用世向度所占的比

① 《山东乡试录》，《全集》卷二十二“外集四”，上册，第843~844页。

② 钱德洪：《年谱》，《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弘治十七年甲子”条，下册，第1226页。

重显得最大和最突出。

阳明主考山东乡试始毕，旋即改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遂在京倡言身心之学，开始招收门人，讲学以立志成圣为宗旨。时人多目为立异好名，惟湛甘泉（1466~1560）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二、大悟格物致知之旨

兴趣十分广泛的王阳明，虽然大体已以步入儒家圣学境域为终生宗旨，但释道两家对他依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任侠、骑射、辞章等也耗去了他不少时间精力。严格地说，尚不能称为学有宗主，诚如湛甘泉所说：“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①直到正德元年（1506年）谪贵州龙场驿丞后，才真正浪子回家，归正于儒家圣贤的道统学问。依据湛甘泉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他十五岁已能骑射，任侠性格一生都有表现，这使他颇有豪迈不羁、大心仁人的儒者气象，而有别于谨守规矩绳墨的一般拘拘陋儒。佛教与道教则始终是建立自己心学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尽管不久他就在学术立场上与释道二家分道扬镳。辞章方面的才能在少年时代的诗歌创作中就有反映，进士及第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等文坛领袖以才名争驰骋^②，即使从清人的视域观察，也“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③。同时，他又爱好兵法，关心时政边事，曾访客居庸、山海关，纵观塞外山川形胜，演习过八阵图，建言卓有远识，识者当时就知道他有远志。可见“豪雄”与“儒雅”集于一身，始终都是他一生个性气质的两大特点。王门后学很少出陋儒或俗儒，这当然也与阳明个人及其学术品格的影响有关。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的悟道，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正德元年（1506年）武宗初政，宦官刘瑾舞弄朝政，南京科道戴铣等上疏请罢刘瑾，忤旨入狱。阳明以兵部主事小职，不顾刘瑾狡残凶狠，仗义执言，抗疏引救，结果遭害下狱，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翌

① 湛甘泉：《阳明先生墓志铭》，《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下册，第1401页。

② 黄宾：《阳明先生行状》，《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下册，第1407页。

③ 《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七一“集部别集类”《王文成公全书》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98页。